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12辑

DANG DAI XUE ZHE REN WEN LUN CONG DI SHI ER JI

Tamen deyan shuo er shishi jiji nüxing zuojiachuang zuoshuping

她们的言说

—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

宫东红 著



华龄出版社

她们的言说

——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

宫东红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的言说——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宫东红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6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2辑)

ISBN 7-80178-387-5

I. 她… II. 宫… III. 女性—文学创作—风格(文艺)—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150 号

书 名:她们的言说——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

作 者:宫东红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34)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7.25

字 数:202 千字

全套定价:280.00 元

她们的言说

——代前言

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多少年来，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她们既是美丽、爱情、无私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淫荡的标志。她们时而被推向伟大神圣的殿堂，时而又被贬入万恶不赦的地狱。有人说，女性是雾里花水中月，这显然是男性站在自身的视角下对女性充满神秘疑惑的推测，他们确实无法真实地解读女性，“女人是什么”要靠女人自己来言说。然而，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剥夺了女性言说自己的话语权，女人无权言说自己，直到“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女性得到了有史以来思想文化的空前解放，她们开始大胆地言说自己，剖白自己，当然女人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处于一种探寻摸索状态。“女人是什么？”“女人应该是什么？”“女人能够是什么？”伴随着这样深刻而迷惘的问题，女性开始了自己的探求之路，而文学创作则成为女性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最佳表现方式，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史，就是现代女性言说自己的历史。

一、文学是女性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寻求自我的方式

文学是现代女性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寻求自我的最佳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的历史，伴随着人性的“自觉”、“自

2 她们的言说

省”和“自我张扬”，女性也从历史的沉沦中逐渐浮出地表，她们凭着自身对文学的一份热烈而持久的激情和爱恋，在这块土地上大声地歌与哭，纵情地爱与恨，极力地感应于宇宙万物，从中寻觅自我，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慰藉自我。文学犹如女性挚情深爱的恋人，她们在自我的创作中款款倾吐，细细体味，愤愤表达，袒露心灵的风景，寻求情感的合唱。她们用自己细腻的情感，独特的体验，敏锐的感知，描绘了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从“五·四”新文学产生以来，女作家群芳绽放，异彩纷呈，冰心用博爱的情怀表达自己，以母爱拯救世界；萧红情感受挫，用手中纤细的笔冷静地描述了生死场上挣扎的女性；张爱玲将轰轰烈烈的一段倾城之恋演绎成“一个苍凉的手势”；茹志娟有感于自己丈夫被打成右派后人际关系的荒凉，有感于对战争年代人际关系的温馨，从而写出名篇《百合花》；杨沫的《青春之歌》像一首细腻的春曲，流泻着女性特有的情致。文学发展进入到新时期，女作家对文学表现出了较之男性作家更加丰富多彩的姿态，有女诗人舒婷深情缱绻、清丽柔美的关于爱情的吟唱；有含蓄、深沉而又充满内在热力的宗璞，一部《红豆》细致地表现出知识女性在特定的政治话语中，面对祖国、爱情的两难抉择；更有敏锐而细腻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清醒而深刻的张辛欣《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大胆而深厚的王安忆的《长恨歌》；个性而诡异的林白、陈染；历经沧桑而神秘的铁凝；更不必说90年代盛行的卫慧、棉棉等等，女性们就是如此以口唱笔录的方式，开始了对文学恋恋不舍的寄情与眷恋。20世纪女性与现代文学创作相依相存，相抗相慰，女作家们总是那么忠实地，含泪带笑地向文学倾诉着情感与心灵的秘密，表达着生命本体最真最深的感受。女性与文学，是割舍不断的情感之链，是生死相依的精神同盟。

二、20世纪女性写作是文学现代性的具体表现

20世纪的中国人确实不同于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人。现代性是这个世纪的人最鲜明的一个尺度，身处20世纪的中国女性也决然不同于

过去的那些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女性。作为一个女性群体,是在这个世纪浮出了历史地表,逐步获取了政治、经济的地位,中国的女性解放问题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问题,的确和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

女性写作的现代性意义一是表现为:女人的觉醒和女人权利的争取是“人”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人的主体的觉醒,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和作为人类的一半的女人的觉醒和女人的权利的争取,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性文学之中。正如法国女权主义者艾莱娜·西苏所言:“女性的文本必将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那外壳就是男性欲望的载体,别无他路可走,假如她不是一个他,就没有她的位置;假如她是她的她,那就是为了粉碎一切,为了击碎惯例的框架,为了粉碎法律,为了用笑声打破那‘真理’”。^① 的确,女性话语在今日是最富有革命性的一种语言。二是“新女性”是一种对女性的现代命名。“五四”以来,20 世纪文学创作中,新女性形象完成了从传统角色到现代角色的转型,在传统角色中的女性,是贤妻、良母、孝妇,这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传统性别秩序之中的女性角色。而现代女性,主要指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特别是在人格上独立的女性。她不再作为性别秩序中的属于谁的母亲,谁的妻和谁的女儿这样的角色,她是独立的人。是所谓“我是我自己的”(子君语)、“我要使我快乐”(《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们要求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首先当然是从反叛家庭,甚至是从要求自由婚姻入手的。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样的生活结构中分离出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走了出来;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走了出来;张洁的《方舟》中的梁倩、柳泉也走了出来,但是,她们很快就体会到了女性解放的苦闷和绝望。同时,张洁明白地告诉我们:“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三是

^①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4 她们的言说

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文学现代性的显著标记。“五四”“新女性”的出现首先对封建父权家庭彻底地进行了彻底否定,对男权文化下的贤妻、良母、孝父角色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女性自觉写作开始,女性自我体验展开,标志着女性现代性进程的开始。80年代之后的中国女性的再次觉醒,具有两重性一个方面是承继着“五·四”以来的那种人的觉醒,再加上被女性主义运动所唤醒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在揭示女性现代生存困境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社会革命的探讨,如张洁、张辛欣早期的小说,她们都意识到作为一种个体生命的权利和作为一种弱势性别他们受压抑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大胆言说女性自身性别现代性经验,写身体欲望、写私人空间、写女人的生活、写生活的私处。如90年代的林白、陈染的写作,从女性生命体验述说现代女性的精神困惑。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就是一个由传统女性文学向现代女性文学转变、过渡并趋于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女性文学学习、借鉴并逐步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历经中西文化大碰撞,新旧体制大变革,男女平等观念大起大落,独立思想大发展并最终形成新的女性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女性的文字话语来传达女性对“真”的向往,对“爱”的渴望,对“美”的追求亦即对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并不断获得自我超越的进程。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本书将从“五四”新文学时期开始到21世纪初,分六个章节分别描述中国女性在追求独立、实现自我,与男权中心意识的抗争中所历经的觉醒、抗争、迷惘及反思的种种过程,并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数十部经典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细致解读,剖析了中国女性在爱恋与怨恨、痴情与不满、渴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痛苦复杂心理,反映了她们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在理想与情感的矛盾中纠缠的心理世界,从而进一步理解女性深层的痛苦与困惑,为建设未来男女两性和谐的社会理想而努力。

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英文为“feminism”,在该词中包含有“女

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它是随着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而兴起的思想潮流，在西方是指一种西方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而在中国，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feminism)则主要指“在对抗、结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①从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批判和重建构成了女性主义的两翼，因此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维安·福里斯特这样表述女性主义的内涵：“妇女将不得不保护自己，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陈腐思想作斗争，与男人们推崇或反对的，同时也经常捆住妇女手脚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她们将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最重要的是精确性，她们必须去观察，去真实而自然地看待自己，要保持这种纯真、自然绝非易事；她们不但要敢于看到自己的玄远梦幻，而且要敢于摈弃旧观念，在一个消沉的世界里看到崭新的，生机勃勃的形象。为什么她们更需要摆脱男人们的目光？因为妇女是有待发现的秘密，她们就是分歧，她们是尚未探索的领域。^② 这就是说，女性主义一方面要通过批判来摆脱男权社会加之于妇女的束缚，另一方面妇女要通过自我认识与发现来提高女性的自觉意识，创造自己的未来。前者是解构性的，后者是建构性的。前者是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审视，对男性作家作品的剖析，对男性标准的抨击来实现的；后者是通过对女性传统的清理，对女性作家创作状况的关注，对女性写作的鼓励来实现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它反映为女性意识的鲜明，女性视角的突出，是女性写作的典型文本形态。

[女性写作]女性写作就是把“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

^① 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N]，《作家报》，1998-09-17。

^② 维维安·福里斯特：《妇女的眼睛看到的》，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6 她们的言说

和文本的行为”。^① 20世纪70年代中叶，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针对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写作被视为知识界的活动，与女性无缘。她在《美杜莎的笑声》里大声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的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②由此出发，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强调妇女与身体的关系。在她看来，写作不单单是思想活动，女性身体的节奏是与思想的意识流或写作的节奏息息相关的。女性快感的生理节奏使她们运用了不同于男性的语言特点和节奏，“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已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但这个概念在90年代传入我国后却与它的原初涵义有所不同。中国批评界之“女性写作”指的是由女性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写作，它强调写作者的性别身份，关注女性群体的书写行为。它可以是一种具有女性立场的文学的书写，但也可以包括文学价值不高，可有其作为女性的自传，女性的反抗，女性的口述史，个体生命史的意义和价值的作品。总之，这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概念。它提醒我们时刻注意一种性别立场，给予我们一种阅读和阐释女性作品的方法，但同时又避开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话题，避开了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代替文本的阐释方式，把女性写作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阐释空间。但无论怎样，女性写作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创作的主体来界定，女性写作必须忠实于女性独有的领会和体验；二是从作品（文本）的效果来界定，女性写作是包含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

[女性话语]女性话语这个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女性话语是指女性写作通过文本传达出的女性意识，即一方面接受性别差异论，解构启蒙意义上的“中性”的“人”的概念，指出男性精英

① 肖沃尔特：《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

②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文化在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对女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进行压抑的事实；另一方面接受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论，打破长期以来的性别本质主义的观点，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双性和谐的社会文化模式。狭义的女性话语则是指女性写作的话语表达特征。因为归根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女性写作，强调女性话语也意味着尝试一种从文学媒介——语言自身，去发现并颠覆男权文化的可能与途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性写作的两种策略：一是采用游戏的姿态，在接受父权制的语言中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游戏文本，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另一策略是立足于女性的躯体和欲望，因而有“身体语言”的提倡。所谓“身体写作”也是通过自己的肉身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①女性可以写她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的一切。基于自己的本真的心理和生理体验，女性在其话语表达方面往往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征，如私语性、个人化、深情叙事、想象力奔涌以及唯美追求等等。这一切在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往往构成了对男性文化的解构和颠覆力量，形成足以于男权文化抗衡的文学景观。

[女性意识]女性意识一般指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本质的确认和坚持。它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从属地位，要求妇女解放。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在自有父权制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处在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客体的位置上，她们被认为是温柔的、感性的、柔弱的、依附的、被动的、退缩的，与男性的坚强、理性、阳刚、独立、主动、进取正好形成了二元对立，因而她们是次于男人的“第二性”。但是这种对立是与生俱来的吗？否。它是父权制的社会意识以一系列的文化设定来规范女性，久而久之形成女性自律的一种恶果，这种恶果直到今日仍在制约着女性的发展。概而言之，女性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被遮蔽、被压抑、被限制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

^① 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J]，《文艺理论研究》，2003 年版。

8 她们的言说

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学,她们言说自己的权利被剥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未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文化地位。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求得更大发展,女性必须认识到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性,并对这种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角色规范加以颠覆。*gender* 这一词语的出现正标志着当代西方妇女在认识上的飞跃:即女人的命运不是由生理决定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改变男子中心文化规定的一套行为准则。

[女性批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强调女性的阅读体验,认为这是女性的人生体验和主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女性只要运用自己的潜在经验对于文本提出文学的或政治的批评,尤其是将传统文学批评中欠缺的性别视角引入,就可以发现并纠正传统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偏颇,从而可以更正确地理解文本。在这里女性经验成为女性阅读效果的来源。通过自己的主体经验,女性阅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实现自己的阅读期待。在阅读过程中,又因为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所以她们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男性文本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进而从一个新的批评角度去研究作家作品,提出新的见解,修正以往的偏见。

目 录

第一章 觉醒·抗争·迷惘

——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综论	(1)
第一节 让母爱拯救世界	
——解读冰心小说《超人》	(11)
第二节 高门巨族的精魂	
——解读凌叔华《绣枕》	(18)
第三节 不安宁的女性生灵	
——解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24)

第二章 游离·抗拒·绝望

——三四十年代女性创作综述	(30)
第一节 在生死场上挣扎的女性	
——解读萧红《生死场》	(40)
第二节 女性的抵抗性生存状态	
——解读张爱玲《金锁记》	(46)
第三节 走出婚姻的围城	
——解读苏青《结婚十年》	(53)

第三章 崇拜·缄默·尴尬

——建国 17 年女性创作	(60)
第一节 革命宏大叙事中的女性文本	
——解读杨沫《青春之歌》	(70)
第二节 政治意识与爱情故事	
——解读宗璞《红豆》	(75)

2 她们的言说

第三节 人性美的赞歌

- 解读茹志娟 (81)

第四章 顺应·对立·追问

——新时期女性写作 (89)

第一节 爱,是不能忘记的

- 解读张洁女性情爱小说 (102)

第二节 渴望飞翔

- 解读张辛欣女性小说创作 (108)

第三节 心灵的守望者

- 解读铁凝 (113)

第五章 自闭·自恋·私语

——90年代女性写作 (127)

第一节 把自己写进文本

- 解读女作家林白 (137)

第二节 真挚地表达自己

- 解读陈染 (156)

第三节 喧嚣·狂欢·迷失

- 解读卫慧、棉棉 (169)

第六章 冷静·沉思·多元

——20世纪末女性写作浅论 (180)

第一节 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

- 解读方方《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184)

第二节 灵魂何处安居

- 解读池莉作品中的女性 (189)

第三节 上海弄堂的女性悲歌

- 解读王安忆《长恨歌》 (207)

主要参考书(篇)目 (214)

第一章 觉醒·抗争·迷惘

——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综论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言：“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深浊的地平线。”^①这一瞬间指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首次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浮出历史地表，同男性作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走上社会，接受新思想。以新的观念、新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表达觉醒了的现代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同时也真实地坦露了她们在追求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精神困惑。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在创作群体、作品主题、情智冲突，及对爱情内涵的复杂性探索等方面第一次全面展示了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权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开启了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话题。

一、女性作家的出现呈现“集团化”的特点

“五四”时期，伴随着现代化的萌动，“人的觉醒”意识的确立，女性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研究 [M]，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3 年版。

2 她们的言说

作家的创作风起云涌，呈现出“集团化”的特点。所谓集团化预示着两个方面：女性作家数量多；女性创作探索领域广泛。在这个相对的时间长度内人数密集，作品数量多，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位置上言说她们的心声，这些作家主要有冰心、陈衡哲、庐隐、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冯沅君、丁玲、陆晶清等，大多数文学史家把她们按时间分为三批：冰心、庐隐及陈衡哲为第一批，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为第二批，丁玲、谢冰莹及白薇等为第三批。20世纪在文学史上女性小说创作的第一人是陈衡哲，1918年就开始发表小说，只是当时的名气并不十分大。冰心显然是第一集团中领军式的人物，庐隐、凌叔华、丁玲都以自己不同的风格描绘了当时文坛的奇异风景。她们的写作，对于中国的女性运动来说，是有先遣意义的。在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中，“女性写作”是对传统反叛的最有效形式，表明了女子首次可以在文坛舞台上的“独立”。“五四”女作家这一集团的出现，不仅在数量上形成规模，在理性观念上也有自觉的女性意识。这表现在她们的写作所关注和表现的具体内容上，她们关注社会、关注人性、关注女性的自身命运，创作了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问题小说的作品。“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①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女作家，她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的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她们关注社会，关注制度，关注教育，关注妇女，关注青年，关注儿童。当然，她们以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激情关注社会，改造人生，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尤显稚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思考也大都偏于诗意图和理想。“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来表达她们想要服务于社会而不能实现的精神苦闷，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这种苦闷的根源指示了出来，一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二是黑暗的社会现实。冰心是站在觉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场上质问

^① 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一期。

封建旧家庭的，巴金、曹禺、路翎等在揭露旧家庭中年轻生命的精神苦痛，均可在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中找到最初的现代源头。庐隐、陈衡哲、凌叔华、石评梅、丁玲从女性角度思考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事业的矛盾，并用大量的书信体、日记体创作，倾诉在黑暗社会里，青年知识女性的精神痛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母爱”主题的建构

对“母爱”的弘扬和赞美是“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母爱形象、母女情深频频出现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成为创作的一个聚焦点。“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时，首先把眼光投射到了“母爱”这一主题之上，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五四”女性与母亲之间的事务联系和情感联系都远远大于她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女性的母爱，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的母性驱力，它是天然的，不受任何意志左右。正因为母性驱力是一种天然的品格，因此女性作家在创作作品时，都摆脱不开一种家庭情境。它是封闭的，同时又是开阔的，女性在这个天地里完成着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所以，一旦选择了文学创作，就能在这男性欲望毁灭的激烈中，发出赞美自我的心声。这是女性出自天然的歌唱，是一个女性对世界执着的告白。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最初更是通过对母亲生存境遇的观照中产生的，这也正是“五四”女作家之所以把她们创作的重心不自觉地放在了“女儿——母亲”的情感表现主题之上的根本原因。

在冰心、冯沅君、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的眼里，母亲首先是养育儿女，挚爱女儿的恩者。这些女作家很少去设置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让母亲在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儿女的利益之间做出抉择，她们年轻的心也还未曾注意到母亲在孕育、分娩这些特殊时刻的艰辛困苦，而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细腻地体察母亲对女儿的关怀。冰心的创作在这点上最为典型，在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作品中，在她笔下

4 她们的言说

最为感人的女性形象是母亲，这位母亲首先是她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位善良，宽容，热爱家庭，知书达理的母亲。“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地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地爱着‘家’，以为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的母亲》）。冰心深情地赞叹道：“她的爱不但包围了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为爱我，她也爱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正是有了母爱，才有了这美好的一切。在悼念母亲的散文《南归》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已缠绵病榻的母亲的情怀，当冰心艰难地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惦念的依然是女儿：“可怜的，她在船上也许时刻提心吊胆地想到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过去了，你好好的睡几夜，便回到北平去，那时什么事情都过去了。”这就是冰心的母亲，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

“五四”女作家冰心不仅歌唱了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还把这种质朴的情感升华为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慈母襟怀成为“五四”女儿们最安全的心灵港湾。在“五四”女作家看来，母爱就是整个世界走向光明的精神动力，这种只有女性才独有具备的圣洁“母爱”，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驳，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热忱肯定。作为长期被困于旧家庭的传统女性，母亲不仅是女儿的庇护者，同时又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是无法反抗的弱者。“五四”女作家还以现代女性的觉悟去审视母亲作为家庭女奴的人生境遇，悲悯母辈的苦难。在苏雪林的小说《棘心》中，婆婆的外部压迫和自己的内心蒙昧把母亲钉在形同奴隶的位置上不得动弹。对母亲的苦难的认识，在苏雪林的创作中并没有指向对男权力量的直接抨击，没有指向对女性觉醒的热切呼唤，而是与同情、敬爱母亲的情感紧密相连。凌叔华的短篇小说《一件喜事》则从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的视角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男权绞索勒在母亲辈女性的脖子上，逼迫她们在受伤害的时候还要做出欣喜的姿态，以掩饰一夫多妻制度的罪恶。在另一篇小说《八月节》中，凌叔华则从家庭传宗接代的角度再次揭示了母亲辈女